

茅、老、郭“触电”

朱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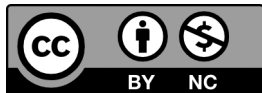
摘要 | 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学大师跨界电影创作，折射特定文化环境状貌。

关键词 | 电影；现实；结果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中国电影勃兴，曾借助文学力量。堪称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老舍、郭沫若，就亲自介入电影剧本创作，虽由于各种因素终未登上银幕，但为建国伊始电影与文学曲折前行，留下特有印迹。

一、茅盾：直击反特斗争

作为我国新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茅盾，其成就最高、最为擅长当为小说，介入电影创作是为配合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所需，与其著名小说《腐蚀》被改编拍摄电影有关。

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展革命胜利成果，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右倾偏向

的指示》，同年12月开始，逐步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肃清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遗留的匪患，确保社会秩序安定，以支持和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和各项改革建设工作。

恰在其时，茅盾于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流亡香港时所写小说《腐蚀》，经柯灵改编、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等饰演，由文华影片公司出品上映。影片以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为背景，通过女青年赵惠明因爱慕虚荣和物质享受，被特务机关利用对抗日志士小昭进行反间，最终在其坚强不屈精神感召下，灵魂又渐复苏，认清特务罪恶，跳出魔窟奔向光明，实现了茅盾的创作初衷，以“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沉沦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

奸险和残忍，他们对纯洁青年的残害，对民主运动和进步力量的血腥镇压，以及他们内部的尔虞我诈和荒淫无耻”。^[1]

当初小说《腐蚀》发表后，先是在香港和东南亚引起轰动，继而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产生反响，解放区曾作为内部学习材料推荐，指定党员干部必读，以认清国民党特务的黑暗统治。改编拍摄电影后，被列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运动月”佳片，在全国上映广受好评，媒体踊跃发声，京沪相继组织各界座谈，称道影片具有现实意义，认为“中国大陆上的敌人已经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被打垮，但是有些人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阶级的本质认识模糊；这些人可从《腐蚀》里，加强自己对反动集团的认识，和对特务的憎恨。另一方面，结合今天抗美援朝卫国保家的爱国运动，提高对暗藏特务的警惕”^[2]。

正是电影《腐蚀》的热映效应，显示了揭露国民党特务统治残忍和黑暗，印证镇压反革命运动必要的形象化宣传作用，引发负责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恳请茅盾写一部反映镇反运动的作品，最好是电影剧本，以这种最为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向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推动运动深入开展。^[3]

茅盾在一番谦让之后，答应“试一试”。一方面，因罗瑞卿一再盛情要求，并且表示可提供一切方便，包括查阅重大反革命案件的全部档案，令跻身政府组成领导成员的茅盾感到，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责无旁贷，应予配合支持；另一方面，茅盾觉得出任文化部部长已逾年余，一直未再问津心仪的创作，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天天号召作家写工农兵，亦应践行垂范，加之《腐蚀》是继《春蚕》之后，自己作品又一次被搬上银幕取得成功，欣喜之际对电影样式有所兴趣与期待，有意亲自上阵“牛刀小试”。^[4]

一向奉行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茅盾，恪守注重生活观察、体验、再现的创作方法，因公务繁忙时间紧张，除委托电影局派来协助的电影局专职编剧袁文殊，代为赴津、沪、青岛等处收集反特斗争相关材料外，茅盾于1951年4月亲自前往罗瑞卿提示的镇反运动进展显著的上海，了解所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详情，电影局主持艺术委员会的著名编导蔡楚生、专职导演张客等陪同。在沪工作20多天，得到陈毅市长、分管镇反运动的潘汉年副市长的大力支持，两次听取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全面报告和详细介绍，调阅大量卷宗资料并作札记，参观上海反特治安展览，与侦办美蒋特务破坏活动案件人员深入交谈，重点了解历时3个月破获的一起“洋特务”电台案经过，并实地察看其“怪异”居处，并剖析了蒋特一个上海站家族台的案例，直到离开上海当天，还抢在晚班车之前赶赴“逸园”参加万人公审大会，亲睹九个美蒋匪特、工贼、电台犯、所谓“顺政国皇帝”等提审全过程。虽然相当紧张，收获颇为巨大，所见所闻令随行采访者屡屡发出慨叹“看得腰酸腿软”“材料极为丰富”“简直就已构成了一个戏”“像侦探小说或电影中所描述者”。^[5]

返京后，茅盾全身心进入创作，先作出详细计划，继又拟订梗概，再写出初稿，历时两个多月，其间不断向蔡楚生、袁文殊、张客等征求意见，完稿后分别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宣部兼

[1] 钟桂松：《性情与担当——茅盾的矛盾人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158页。

[2] 同上，第162页。

[3] 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13，第269页。

[4] 同上，第269—270页。

[5] 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三卷·日记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第399—401页。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新任命的中宣部电影处长江青等审阅，下了不少功夫，最后却不了了之。

这一意外结果原因颇为复杂。“文革”结束与茅盾有过接触的著名作家周而复，曾听其所述：“50年代初期罗瑞卿同志约我写个‘镇压反革命’的电影剧本，因为生活不熟悉，没有写好，我就把它放弃了。”这与其夫人孔德沚所说“我读了这部原稿。我感到他对大革命时代的青年较为熟悉，写出来逼真，对现代青年他不怎么熟悉，写出来的还和大革命时代的青年差不多”吻合。曾参与其间的蔡楚生在日记中亦云，剧本“确有许多问题”。茅盾身后由亲属整理的《茅盾回忆录》，给出更为具体解释：

“罗瑞卿读完初稿基本满意，可是蔡楚生、袁牧之却认为太小说化了，拍电影有困难，而且太长，可以拍上、中、下三集，必须改写和大大压缩。那时如果有位搞电影的行家来帮助爸爸修改压缩，也许就拍成电影了，可是爸爸的名望和地位，使人不便提出这样的建议，而爸爸又从未想到能采用这种办法（这种方法是后来才流行的），他的习惯是自己的作品自己来完成。结果就拖延下来，拖到后来，事过境迁，也就没有再拍电影的必要了。”^[1]

值得提及的是，茅盾对此次电影创作的最后“放弃”“拖延”，与时势变化有一定关系。就在此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政治运动方式发生，并且连带《腐蚀》受到尖锐批评，被指“让人看了以后同情特务”，一些地方甚至“禁映”。前者虽未对有关人员进行政治处理，但居于文化部门领导岗位的茅盾无形之中压力颇大，后者则使身为《腐蚀》原作者、并曾特意在上映前撰文《由衷的感谢》的茅盾，陷入了尴尬，不免对反特电影剧本创作产生影响而难以为继，后来干脆一张张撕掉原稿垫在吐痰杯里自行销毁，也是不难理解之举。

二、老舍：书写新旧变化

老舍是“五四”以来优秀作家，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已享国际声誉，新中国成立后应邀从美国讲学回国，开启创作道路崭新阶段，除了小说、杂文，以写剧本为主，且取得突出成效，呈现特有的新旧交替时代特点，同样见诸于曾奉命创作的唯一电影剧本《人同此心》。

该剧创作源于195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一文，作者是北京贝满女中教师步春生，该文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共产党、社会主义认识的转变。毛泽东主席读后认为有普遍教育意义，应该是故事片电影的好题材，建议电影局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周恩来总理马上亲自给陈波儿打电话布置了这件事。^[2]

电影局遂作重要任务来办，局长袁牧之，艺委会负责人蔡楚生、陈波儿，与剧本创作所长王震之一起研究落实，由谁来担当这部影片编剧成为棘手难题。时值人民电影事业草创，局里现有创作人员不是来自延安，就是从各大军区抽调，正按照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深入生活，以塑造工农兵光辉形象为己任，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生活在国统区刚解放的知识分子，不但不熟悉，而且也没有想到要去熟悉，找不到合适人选。凑巧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龙须沟》正轰动全城，作者即是老舍，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就写出这样反映新旧社会伟大变化的好作

[1] 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之三：朝真暮伪何人辨》，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105页；李标晶：《茅盾传》，团结出版社，1990，第233页；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三卷·日记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第409页；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13，第270页。

[2] 齐锡宝：《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电影创作》1994年第1期。

品,大家不约而同想到要能够胜利完成任务,非请老舍先生来写这个剧本不可。

当陈波儿向周总理汇报这一打算,他十分高兴地表示与其想法“不谋而合”。殊不知,周恩来是老舍接触最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带领其投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周恩来首先想到旅居海外的老舍,亲自提议邀请其回到祖国,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热情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反映新中国的新气象、新面貌,遂有以一条臭水沟居住在新旧社会变迁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龙须沟》问世。正是在周恩来关心和影响下,老舍从一名进步的爱国作家成长为革命的人民艺术家。

电影局即通过北京市委联系,老舍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市委领导提出老舍腿脚不方便,希配备一个助手为他采访收集素材。局里指派曾听过老舍授课的秘书齐锡宝担当此任并兼联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老舍列出的名单,挨个访问了当时协和医院、北大医院、人民医院许多有名的大夫,也访问了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师大附中等几所中学的校长和教师。每逢采访汇报,老舍都认真仔细听取。有一次说起协和医院脑外科陈大夫原来家境贫寒,发奋苦读考进了协和医科大学想学外科,但外科主任说外科大夫的手必细致得能够绣花,你那粗手大脚的哪能学外科。陈大夫二话没说跑到街上买回软缎、丝线和刺绣用的工具苦学刺绣,等到医学院正式分科交上好几件精美无比绣花制品,那位外科主任被其毅力所感动同意攻习外科。老舍听后很为感动,称赞齐锡宝采访时能注意这种素材很好,说“要真正熟悉和了解一个人,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往往很关键”,“写一个性格坚毅的人,它可能就是

个很好的细节。”^[1]

经过详尽收集素材和细致深入酝酿,老舍写出了以《人同此心》为名的电影剧本初稿。以《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为蓝本,吸收众多医务、教育人员的经历感受,融入自己从海外归来的切身体验,通过京城著名外科医生冯光斗一家的衍变,表现了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心路历程。剧情大致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冯光斗看不惯国民党官僚把持医院,独自去英国工作。冯太太岳春江带着3个孩子,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巨大变化,在老同学、共产党员张竹的感染下,满腔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她写的一封封描绘新中国变化的家信,使冯光斗大为感动,促使他毅然回到祖国,担任一个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党的引导帮助下,他克服了重技术轻政治的思想,不断提高觉悟,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了周围的一些人进步。抗美援朝开始,他克服了对美国技术的迷信,带领医疗队奔赴前线,并把自己保存多年的手术器械全部捐献出来,为志愿军服务。

经陈波儿、蔡楚生、史东山、章泯、王震之等传阅研究,从电影化角度提了几点意见,老舍作了修改后,分送文化部各部长和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审阅。由部长兼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沈雁冰亲自主持,召开剧本讨论会,陆定一、周扬、邵荃麟、丁西林、李伯钊等参加,老舍亲自到会朗读剧本听取意见。会上没有人提出否定这个剧本的意见,也没有做出不拍这部故事片的决定。随后老舍又按照会上听到的意见继续修改剧本,电影局准备调抽富有经验的电影编剧柯灵协助。

岂料就在会后不久,刚出任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在找陈波儿商量召开电影指导

[1] 齐锡宝:《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电影创作》1994年第1期。

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1952年电影创作题材规划时，突然提出：“在这次会议上，要设想工、农、兵题材各占多少的恰当比例，更应该制定出写三大战役的宏伟目标，至于由老舍执笔写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1]

陈波儿当时听了还只感到很为难，经反复思考找来齐锡宝，郑重关照“今天上午你在办公室里听到的事情，绝对不能外传，老舍先生是知名的作家，他很热情地为我们写剧本，我们决不能让他感到不快”。让她陪王震之去老舍家，送上《龙须沟》稿费，并婉转告知《龙须沟》的摄制计划已经制定，将来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还会为剧本的改编、外景的选择、演员的深入生活等许多事情去麻烦他，《人同此心》摄制计划如何安排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剧本的修改可以缓一缓。待陈波儿知道江青是以中宣部电影处的名义否定《人同此心》，只得徒唤奈何，唯将《龙须沟》抓在手里，阻止了上海一家私人电影厂改拍，安排北影厂以强大主创阵容将它搬上银幕，算是对老舍一个慰藉。老舍对影片颇为满意，还曾亲笔题写了一幅立轴送给主演于蓝。

“文革”过后，亲历老舍创作《人同此心》剧本前后的齐锡宝披露了往事，这个因遭否定而已湮没的剧本始被发掘出来，《电影创作》将其作为老舍遗著隆重发表。业已成为作家并是中国现代文学馆负责人的老舍之子舒乙专门撰文恺切评议，认为“当时没有拍成电影，不仅可惜，而且客观上还是个很不小的损失。原因有三：一，它是一部诚心诚意地为共产党说好话的作品，这对一个新生的政权的巩固是相当重要的，毛、周二位提议写它的初衷也在于此。老舍先生完全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心悦诚服地写它，毫无说教，端

端正正，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比共产党人自己去直接说要有用得更多；二，它如实地描述了历史巨大转折期里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既决定了新生政权的命运，也决定了整整一代善良的追求社会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三，它很幽默，很活泼，语言写得俏，有人物，很生活化，有着典型的老舍风格；当初没看中它，觉得它不够‘高大’，或者觉得它‘政策’味道不够浓，却是它真正价值之所在。”^[2]

三、郭沫若：颂扬民族英雄

集文学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郭沫若，一生著有众多别树一帜的历史剧，以气势磅礴、文采洋溢享誉艺坛，其中唯一运用电影形式创作的，是1962年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求所作的《郑成功》。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著名军事将领，本名森，又名福松，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名成功，世称“国姓爷”，又受永历帝封延平王，亦称“郑延平”。其一生两大突出表现，分别为英勇抗击清兵与成功收复台湾，后者堪为辉煌壮举。1661年4月，郑亲率将士二万五千余人、战船数百艘，浩浩荡荡自金门起航，展开收复台湾之战，经历屯荒积粮、砥砺兵力、海陆交锋、围困克敌，至次年2月完全驱逐荷兰侵略者，使沦陷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历史知识渊博和历史眼光独到的郭沫若，极为关注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历史之举。1962年1月18日，他于广州出席同时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1] 齐锡宝：《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电影创作》1994年第1期。

[2] 舒乙：《老舍未发表的电影剧本》，《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10月15日。

期间，特赋七律《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台湾自古属中华，汉族高山是一家。岂许腥膻蒙社稷，不教蠹贼毁桑麻。千秋大业驱荷寇，一代英雄赐姓爷。三百年来民气壮，教他纸虎认前车。”^[1]发表于《南方日报》，并在《文汇报》刊出手迹。此前已有《蔡文姬》《武则天》史剧佳作面世，遂有八一厂约请其创作这一题材电影剧本。

当年年底在中国剧协举行的北京老剧作家与各地来京青年剧作者新年联欢会上，主持会议的曹禺将郭沫若完成《郑成功》作为“秘密”透露，应一致要求，郭沫若当场作了介绍：“八一电影制片厂向我出了这个题目，要我来做。他们给我送来了许多关于郑成功的史料，还送来许多电影剧本，以及怎样写电影剧本的理论书籍，一大堆，要我来读。八一厂为我服务得真是周到。他们还为我放映了好些中国的、外国的电影让我看。他们在尽力培养我写剧本。我受到这样的培养，真受感动！我如果不交出作品，真是对不起他们。我写这个剧本，也使我受到一次教育。收集资料是从今年5月开始的，8月间在北戴河，曹禺同志也在那里写《王昭君》，还有金山等同志。我不懂电影的写法，这个蛋实在生不下来。但曹禺、金山等同志他们都鼓励我，要我先不要管电影剧本的形式，写出来再说。还有当时在北戴河的贺总、廖承志同志，以及刘宁一同志也都鼓励我写，我就硬着头皮写起来了。”^[2]

虽然历史剧创作对郭沫若已是轻车熟路，但以往都是话剧剧本，动笔写电影剧本却是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与受舞台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话剧剧本，完全是两回事，这对已届古稀高龄的郭沫若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他为“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反殖民主义的先驱，这个历史人物是值得肯定的”所激励，毅然克服困难和障碍，揣摩熟悉电影剧本的表现

形式，很快构思动笔，于当年10月初写出了剧本初稿。

尔后，郭沫若又亲赴福建、浙江沿海和舟山群岛等处实地考察，搜集相关史料，增加感性认知。他不顾一路舟车劳顿，探访郑成功出生及其家族遗址，寻究人物生成身世，深入海防前沿阵地，踏勘郑成功驻军征战遗迹，为进一步修改完善剧本补充生动素材，沿途披阅随身所携历史资料不辍，仔细参照比对，力求郑成功进军收复台湾得到尽可能完美表现。沿途他挥毫写下20余首诗作，为郑氏祠堂郑成功纪念馆欣然挥笔题联“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表达对维护民族统一、捍卫祖国领土功臣郑成功的无限敬仰和崇高评价，更为强化了创作电影剧本《郑成功》的认知，在厦门大学与文史教师座谈时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一个壮举。如果把它写成剧本，其情节之生动，气魄之宏大，当不亚于《甲午海战》。”^[1]他总结此行“关于郑成功的史料固然有意外收获，但更大的收获是今天在党的领导下，藐视困难、克服困难的英雄气概。因此，我希望我们的文艺界、戏剧界也多多产生出一批英雄。”^[2]

这种“英雄”意识，贯穿于郭沫若最终完成的长达10万字电影剧本，体现了其历史剧作素有的尊重历史真实、富于艺术想象、浪漫气息浓郁、紧扣现实政治的特征。全剧聚焦郑成功毕生事业最为辉煌的反清复明和收复台湾，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以奇特构思和遒劲笔力，着力描写郑成功作为晚明遗臣，攻打清朝管辖的南

[1] 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309页。

[2] 郭沫若：《学习、再学习——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话》，《剧本》1963年1月号。

京城下一败涂地之后，转而克复台湾以为恢复大明社稷基地，在与投降派、反对收复台湾派、荷兰殖民者等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展示郑成功忠诚爱国、能征善治，获得汉族和高山族人民支持，战胜残暴阴险的荷兰殖民者，为统一大业建立功勋，成就一代民族英雄。其结构庞大但层次分明，冲突强烈而矛盾迭起，在跌宕多变、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中，以真实和虚构结合，塑造各种人物形象，既有奴颜婢膝、卖国投降的朝廷命官，迷信军力、无恶不作的入侵敌贼，又有支持统一、援手暗助的乡社土藩、“平民代表”，以及荷兰军曹、黑人水手、意大利神甫等“世界正义力量”，澎湖遇风、奇渡鹿耳门、围困热兰遮城、击退荷兰派遣救援舰队、发现攻城秘密隧道等壮观激烈场面，与民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高山族人以歌唱童谣仇视敌军、汉高异族男女在反殖斗争中相恋等鲜活情景互织交映，烘托郑成功收复台湾统一大业的非凡与神圣，彰显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契合其时“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政方针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主流意识，对西方封锁中国和蒋介石当局试图骚扰大陆沿海图谋是有力回应。

遗憾的是，《郑成功》作为郭沫若唯一尝试“触电”创新和大型文学创作收官之作，仅于次年春季在《电影剧作》发表，并未由专门约写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付诸拍摄。对此原因，曾有推测受制国家高层对台战略变化，亦有归于电影样式特殊把握欠缺，其实最为根本的还是政治时局与文艺形势变化所致。起初八一厂组织这一题材创作，尚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电影与整个文艺工作宽松活跃状态延续，发扬艺术民主、倡导百花齐放仍是主流，故有郭沫若创作《郑成功》所参比的《甲午海战》，还能改编拍摄成《甲午风云》蜚声影坛，待到其剧本创作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风向已陡转，“大写十三年”充当文艺极“左”思潮重泛前导，迅速风行而左右电影创作，古代近代历史题材首当其冲被充斥，《郑成功》失却搬上银幕机会在所难免，经“文革”风暴冲击更被遗忘。直至作者去世后的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之出版单行本，《文学评论》刊登读者来信呼吁应予重视，这部出自文坛泰斗的历史剧压轴之作，始重入人们视线获得关注。

[朱安平 中国妇女报社]